

制度型开放对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的文献综述

曹梦成

东南大学，江苏 南京 215500

DOI:10.61369/ER.2025050017

摘 要： 在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交织的背景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PU）对国际贸易与企业决策的影响日益凸显。中国通过制度型开放战略，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致力于构建稳定透明的贸易政策环境。本文系统梳理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制度型开放的相关文献，探讨制度型开放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机制与研究进展。现有研究显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主要包括文本分析法和关税测度法，其经济影响广泛。制度型开放强调从“边境开放”向“境内开放”的体制性深化，通过规则衔接与制度创新降低政策不确定性。然而，两者间的直接关系研究仍较为缺乏，作用机制尚待深入实证检验。未来研究可结合自贸试验区等城市层面实践，进一步揭示制度型开放影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路径与效果，为中国的开放策略与风险管理提供参考。

关 键 词： 制度型开放；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自贸试验区；文献综述

A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Openness on China's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Cao Mengcheng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5500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ization and trade protectionism, the impact of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TPU)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orporate decision-making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China actively connects with international high standard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through an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strategy, and is committed to building a stable and transparent trade policy environment.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institutional openness, and explores the impact mechanism and research progress of institutional openness on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Existing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measurement of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mainly includes text analysis and tariff measurement methods, which have a wide range of economic impacts. Institutional opening emphasizes the institutional deepening from "border opening" to "domestic opening", reducing policy uncertainty through rule linkage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direct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nd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still needs further empirical testing. Future research can be combined with urban level practices such as pilot free trade zones to further reveal the path and effects of institutional openness on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China's opening-up strategy and risk management.

Keywords： institutional openness;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pilot free trade zones; literature review

一、研究背景

在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并行的背景下，国际贸易格局深度演变。作为全球货物贸易大国与外资流入的重要市场，中国的贸易政策环境对国内发展与全球地位至关重要。然而，伴随全球经贸形势日趋复杂，各国政策频繁调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持续攀升，不仅干扰企业决策与全球贸易稳定，也给中国对外贸易带来多重挑战。在此背景下，系统探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因素及其应对路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制度型开放作为中国深化开放的战略方向，致力于推动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领域的制度创新，并与国际高标准规则深

度衔接。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增强政策透明度、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例如通过自贸试验区等载体，优化行政审批与监管流程，降低企业的政策模糊性；同时也促进国内外规则对接，减少因国际制度差异导致的风险，从而系统性地缓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从城市层面开展相关研究尤为关键。城市是制度型开放落地实施的重要单元，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差异化实践，直接塑造了地方的贸易政策环境。深入分析其影响，既能助力地方制定精准开放策略，也能为国家整体优化制度型开放布局、有效管理不确定性提供微观依据与实践支撑。因此，系统研究制度型开放对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兼具理论与现实价值。

二、文献综述

（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相关研究

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日益复杂的背景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TPU）逐渐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议题。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泛指政府未来经济决策的不可预见性所引发的经济波动，进而对微观企业的经营决策产生影响。TPU则特指因关税、配额、补贴等具体贸易政策的潜在变动而导致的国际贸易环境不稳定性。

作为一个抽象概念，如何有效量化 TPU 是实证研究的关键。目前主流的测度方法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基于文本分析的指数构建法。该方法由 Baker 等人（2016）首创，用于编制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1]。其核心步骤是，筛选美国十家主流报刊，统计自 1985 年以来那些高频出现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相关词汇的文章数量，经标准化处理后形成指数。然而，该方法依赖关键词的识别，而关键词本身可能存在模糊性，可能导致测度结果不够精确（余淼杰和祝辉煌，2019）^[2]。

第二类是广泛应用且操作相对简便的关税测度法。Pierce 和 Schott（2017）在研究中美贸易关系时，率先提出以美国对华适用关税税率与潜在最惠国关税税率之间的差额来度量 TPU，即“直接差分法”^[3]，后续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技术改良，衍生出多种“变体差分法”，进一步丰富了该方法体系。

关于 TPU 的经济效应，国内外学者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Greenland（2014）的跨国数据分析表明，目的国的 TPU 会对出口国的出口总量产生抑制作用，但对出口的集约边际（如现有产品的深度）影响方向并不明确^[4]。针对中国情境的研究发现，TPU 的降低显著促进了中国进口规模的扩张，并同步提升了进口产品的质量与种类多样性（毛其淋，2020）^[5]。此外，汪亚楠等（2020）聚焦于自由贸易协定（FTA）背景，通过对 12 个伙伴国的考察，证实 TPU 下降不仅能推动出口扩张与升级，且对外直接投资（OFDI）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中介角色^[6]。在研究方法上，许多学者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获得的美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地位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进行因果识别。例如，Firooz H（2022）的实证结果表明，入世后的关税削减拓宽了企业的出口产品范围，降低了产品集中度；同时，TPU 的存在增强了出口产品结构对关税减免政策的反应弹性^[7]。

（二）制度型开放相关研究

关于“制度型开放”的研究，自 2018 年首次提出以来，迅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新阶段中，制度型开放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国外研究虽未直接使用“制度型开放”这一术语，但其对非关税壁垒与规则协调的探讨在本质上与之相关。随着关税水平普遍降低，国际经贸谈判的重点日益转向以规则趋同为目标的非关税壁垒议题（Grossman 等，2021）^[8]；Bagwell 和 Staiger（2002）曾警示，若各国在制定贸易政策时缺乏共同规则的约束，仅顾及本国利益，即便无意实施保护主义，也可能引发全球性的

经济困境^[9]。

国内学界则对制度型开放的内涵、价值与实施路径进行了系统阐释。在价值层面，钱克明（2019）指出，制度型开放代表着一种更具深度、广度、系统性与公平性的开放理念^[10]。

在规则与体制层面，徐康宁（2019）认为，推进制度型开放需着力构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规则体系，并推动治理体制的创新与开放^[11]。张二震等（2019）进一步阐释了其空间维度，强调制度型开放意味着开放重点从传统的“边境开放”（如关税减让）向“境内开放”（如国内规制、市场准入）的纵深拓展，核心在于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兼容的国内制度环境与治理体系^[12]。常娱和钱学峰（2022）则从双向视角定义了制度型开放：其一是“对外对标”，即主动与国际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接轨；其二是“对内整合”，即构建统一、高效的国内大市场，破除内部制度壁垒^[13]。总体而言，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秩序深度调整，推动制度型变革已成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与国际经贸规则演进方向的必然选择。

（三）制度型开放对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研究

目前制度型开放对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的直接性研究比较少，李思敏（2019）将制度型开放与自贸试验区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明确自贸试验区的建设需要围绕制度型开放发展，在更高起点上支持和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实施更加便利的跨境资金流动管理，探索金融创新领域的中国方案、中国标准，构建对标国际高水平的金融营商环境^[14]。赵蓓文（2022）基于“双循环”发展背景出发，明确提出制度型开放通过提高规则的对接、制度创新、寻求合作空间、战略协同、参与和引领国际规则以及提供更高水平的制度供给等途径，能够有助于降低中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15]。中国通过加入 WTO 和参与其他国际经贸协定，如 RCEP、CPTPP 等，主动对接国际经贸规则，这有助于减少因规则不一致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

（四）文献述评

综上所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研究上，国外测度方法有文本提取法与关税测量法，前者由 Baker 等提出后被拓展应用，后者以 Pierce 和 Schott 为代表且有变体。其影响包括对出口规模、企业投资等方面。国内研究中，文本提取法精度不足，魏明海等提出的方法有局限，关税测量法较普遍。众多学者探讨了 TPU 对进口、出口、企业创新等多方面影响。制度型开放研究上，国外主要聚焦贸易壁垒，如非关税壁垒谈判、规则趋同及贸易监管作用等。国内自 2018 年提出制度型开放后受关注。在价值层面，学者们阐述了其深层次开放内涵及意义。发展历程上，中国已进入制度型开放阶段。实证研究方面，有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度水平及考察对企业效率影响等。在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上，李思敏关联自贸试验区，赵蓓文提出在“双循环”下通过多种途径可降低不确定性，中国对接国际经贸规则有益。总体来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研究成果多，但测度方法待完善。制度型开放研究理论多实证少，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的直接研究匮乏。后续应强化实证，挖掘其对贸易等多方面影响不确定性的路径与效果，助力政策制定。

三、总结

在剖析制度型开放对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时，需紧密依托国际贸易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多学科理论体系。然而，由于制度型开放作用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传导机制极为复杂，涵

盖政策协同、市场预期调整等多个层面与诸多因素，研究难度较大。在梳理已有文献过程中发现，过往研究多采用特定指标来表征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或制度型开放程度，但这些指标难以全面涵盖各因素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无法充分展现理论深度与广度。

参考文献

[1] Baker S R., Bloom N., Davis S J. Measuring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6(4): 1593–1636.

[2] 余森杰, 祝辉煌.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度量、影响及其政策意义 [J]. 长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21(1): 8.

[3] Schott P., Pierce J., Schaur G., et al.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the structure of supply chains[C]. Meeting Papers. Society for Economic Dynamics, 2017(788).

[4] Greenland A et al. Polic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gin of Trade[Z]. SSRN Working Paper, 2014.

[5] 毛其淋.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影响了中国企业进口? [J]. 经济研究, 2020, 55(02): 148–164.

[6] 汪亚楠, 王海成, 苏慧.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产品出口的数量、质量效应——基于自由贸易协定的政策背景 [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0(1): 111–119.

[7] Firooz H, Liu Z, Wang Y. Automation and the Rise of Superstar Firms[C].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2022.

[8] Grossman G. M., Mccalman P., Staiger R. W. The “New” Economics of Trade Agreements: From Trade Liberalization to Regulatory Convergence? [J]. Econometrica, 2021, 89(01): 215–249.

[9] Bagwell K., Staiger R. W. Delocation and Trade Agreements in Imperfectly Competitive Markets[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015, 69(02): 132–156.

[10] 钱克明. 更加注重制度型开放 [J]. 对外经贸实务, 2019, (12): 4–6.

[11] 徐康宁. 扩大对外开放的新机遇、新理念与新方向——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文明互鉴与制度型开放 [J]. 江海学刊, 2019(1): 9.

[12] 戴翔, 张二震.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制度型开放 [J]. 国际经贸探索, 2019, 35(10): 12.

[13] 常娱, 钱学锋. 制度型开放的内涵、现状与路径 [J]. 世界经济研究, 2022(05): 92–101.

[14] 李思敏. 制度型开放与自贸试验区金融高质量发展 [J]. 南方金融, 2019, (12): 3–7.

[15] 赵蓓文.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制度型开放的创新实践 [J]. 思想理论战线, 2022, 1(03): 106–112.